

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 对待历史文献资料

谭 其 骧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这已为当前所有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所一致公认。现代地理学所要研究的,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也就是历史地理所要研究的对象。二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以研究当前地理现象为主(有时当然也要追溯到过去),后者以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为主(有时当然也要联系到现在)。既然如此,所以历史地理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很明显的。旧时代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前一个时期有人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历史与地理之间的边缘学科,这些看法目前至少在我国国内已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当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急需通过讨论予以明确的,看来已经不是学科的性质问题,而是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不解决、不明确,这对于扩大我们的队伍,促使我们的青年同行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是很不利的。在这里我谈一谈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意见,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近一二十年来,有好几位历史地理学家在谈到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时,都着重指出研究历史地理必须重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野外考察的方法,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事实确是如此,有许多依靠文献资料解决不了的历史地理问题,一经实地考察,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史念海同志在他的《河山集》二集^①序文里列举了他近年来通过野外考察解决的重要历史地理问题共有二十多项,就是很好的例证。侯仁之同志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越前人,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北京市。他对沙漠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和他的实地考察工作是分不开的。

但是,我们若因此便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依靠这些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历史地理的问题,那可是绝对错误的。历史时期的地理,换句话说,就是过去了的地理情况。这种情况少数是有遗迹保留到今天的,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进行研究。但那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却不可能有遗迹留下来,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过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要研究这些已经过去了的消失了地理情况,那就非得依靠历史学的方法不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虽然属于地理科学,但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却既不能说只需要运用地理学的方法,也不能说要以地理学的方法为主,至少

^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年 5 月出版。

应该说运用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不下于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当然,近一二十年来写过论述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同行们,谁也没有说过不需要用历史学的方法。侯仁之同志就曾在他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①中提到,研究历史地理“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的训练,熟悉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并能运用一定的历史方法”。陈桥驿同志在他所写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②的总论中也说,除了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外,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科学分析,也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不过这些文章主要都是为了纠正旧时代学者关起房门,足不出户,埋头在故纸堆中,完全不做野外考察的偏向而写的,所以都是在强调地理学的方法、野外考察的方法之后,对历史学的方法、文献整理的方法只是带上一笔,没有能够予以足够分量的阐述。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来,一方面只搞文献不做实地调查这种偏向并没有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身上却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即忽视历史学方法,忽视文献资料的偏向。偏向都应该纠正,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当前后一种偏向毛病更大,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一下,凡是有志于研究历史地理的青年同志,不能犯这种偏向,犯了这种偏向的,务必努力予以克服。

首先,研究历史地理不能局限于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更重要的是还得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历史经济地理要研究历史时期的产业、作物、工矿、商业和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交通路线的开辟和城市的兴衰,各个地区的开发过程,等等。历史人文地理要研究历史时期国家疆域和行政区划的沿革,民族的分布与迁移,不同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区域的形成及其演变,文化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方面所包括的课题,很显然,你要是不从历史文献中下功夫去搜集大量的资料,那是根本无法进行研究的。史念海同志的《河山集》初集^③可以说是一部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有讲地区产业发展的,有讲交通路线的,有讲经济都会的。他在写这些文章时还并没有进行过野外考察,他完全依靠历史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写成了这么一部有很大贡献的论文集。反过来我们可以设想,要是不收集历史资料,只做野外考察工作,这些文章肯定是一篇也写不出来的。

其次,应该注意到,许多著名学者所取得的出色研究成果,包括研究历史自然地理,也都是离不开历史资料的,或者是主要取材于历史资料的。例如,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气象学家竺可桢同志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④,是一篇权威性的著作。他研究五千年的气候变迁,分成四个时期,只有1900年以后的第四期是依靠仪器观测资料的,此外三个时期四千九百年,全部依靠历史资料。第一期依靠考古资料,就叫考古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的殷商时代取材于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考古资料,也是文献资料。第二期物候时期,取材于从《诗经》到元代文献中的物候记载。第三期方志时期,取材于明清两代地方志中有关气候的记载。

再如,侯仁之同志研究乌兰布和沙漠地理环境的变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仁之同志是亲自进入这个地区做了细致的考察工作的,但是,他之所以能发现这一地区古今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键还是由于他把目前的情况跟《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里的记载进行了对比。要是只做实地考察工作而不熟悉这些文献资料,那是不可能作出这样出色的研究成果的。

又如,有些林学家认为黄土高原根本不适宜于成长森林,不承认过去这里有过森林。史念

① 见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② 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版。

③ 三联书店1963年9月出版。

④ 《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海同志的《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①，强有力地驳倒了这种说法。他搜集了好几百条历史文献资料，确证历史时期的早期在黄土高原上到处都分布着森林，随着人类社会的活动逐步加剧而逐步缩小，直到明清时代，才和今天相差无几。我想那几位林学家看了史念海同志那篇文章之后，是无法不改变他们原来的信念的。可见解决历史地理问题，文献资料有时比根据目前的地貌、土壤、水文等条件所作出的分析更可靠些。

二

以上泛泛谈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下面再进而谈谈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问题。

历史资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考古资料，一类是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通过这些实迹实物可以如实地复原古代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是科学性最强的资料。但是，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活动是不会有有什么遗迹遗物留传下来的，再加遗迹遗物一般是不会说话的——没有文字铭刻。所以，就有了文字记载以后这三千年来的历史时期而言，考古资料所能起的作用，毕竟还是赶不上文献资料的，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主要得依靠文献资料，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地理也不能不如此。而这一段时期由于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当然也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如何搜集、整理，如何鉴别、分析文献资料，事实上也就不能不是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关键性环节。要全面论述处理好这个关键性环节的方法，那是可以写成一部几十万字的专著的。在这篇文章里，我只预备讲当前特别值得重视的三点：

第一点，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我们研究任何课题都切忌凭少数几条资料就下结论，这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当然也用不着要求百分之百地搜全所有资料，这往往是难以做到的，一般说来也是不必要的。勉强这样做还会导致文章写得很烦琐、很噜嗦。但是，我们应该要求做到基本上齐备，也就是说，重要资料、关系到得出怎么样的结论的资料不能遗漏。资料是否基本齐备会影响到结论是否正确，我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

从陕北无定河北岸迤北到内蒙古乌审召、鄂托克旗一带有一片沙漠叫毛乌素沙漠。有相当一段时间地理学界流行过一种说法，认为这片沙漠在五世纪以前原是一片肥美的草原，是五世纪以后才随着人类的活动而逐步变成沙地的，有的甚至认为沙漠南部的形成不过三四百年，解放以前二百五十年沙漠向南扩展了六十里。且不谈后两种说法，只谈流行得最广泛的前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沙区南部今陕西靖边县北红柳河北岸的白城子废墟，是公元413年五胡十六国中夏国所筑的都城“统万城”的遗址，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夏国国君赫连勃勃曾经登上统万城附近的契吴山，举目眺望，赞叹这一带的山川景物之美，说是“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条史料说明了在统万城建城的时候，这里显然还不是沙漠地区，而是景物很优美的一块好地方，这里变成沙区，应该是统万城建成以后又经历了若干岁月才开始的。尽管开始于何时的具体年代各家的推论有所不同，但五世纪初这里还没有受到流沙侵袭这一点是这许多学者所一致公认的，几乎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定论。可是，赵永复同志写的《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一文^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①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

^② 载《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赵永复同志的文章详细论证了那种白城子附近的流沙形成于唐以后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根据北朝的记载,那时上距赫连夏不过百余年,这一带很明显是到处分布着沙陵、沙阜、沙溪的游牧区。作者认为至迟东汉,即公元二世纪时,这一带可能已有流沙的活动,因为见于东汉记载的奢延泽,应该是红柳河上游一条支流八里河被流沙堵塞出口而形成的。赫连夏时代这里的地理景观和北朝时代不会有很大差别,赫连勃勃用“临广泽而带清流”这句话来赞美这里的景观,“广泽”“清流”不一定是优美的草原,很可能正是沙漠地区的现象,因为沙漠地区的河流,水源来自泉水或地下径流,往往是很清澈洁净的。至于赫连勃勃之所以要在这里营建都城,他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如何优美富饶,而是在于建都在这里有利于防御近在数百里外强敌拓跋魏的侵袭。

这篇文章所论证的观点是否完全能成立我不敢说,但至少动摇了过去流行的那种说法,把对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作者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除了他严肃谨慎的研究态度外,主要由于花大力气搜集了近百条以前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没有掌握到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说,他做到了资料基本齐备这一点。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就要比资料不及他齐备的高出一筹。

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有些文献资料来源于民间传说。尽管传说一经用文字记录下来也就是文献资料了,但事实上传说往往并不反映历史真实,我们做研究工作不能贸然把这种资料当作真实史料看待。

例如,“榆林三迁”的传说传播得很广,屡次为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作为陕北一带沙漠南移的证据。实际却根本没有这回事。侯仁之同志的《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的起源和地区开发》一文^①,根据可靠记载,查清了榆林自1472年建立榆林卫以来五百年的情况:曾经多次拓建,比较重要的有三次。历次拓建都没有离开原址,所以“榆林三迁”,应该是榆林三拓的讹传。这就破除了沙漠南移,五百年中使榆林三次向南迁移城址,这种迷惑了不少地理学者的立论根据。

这一类被前人记载下来的靠不住的传说,各种书里都有,研究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培养锻炼自己的鉴别能力,不能见了刊印在古书上的资料不加辨别,一概置信。这是一项必要的基本训练。不经过这种训练,是很难正确运用历史文献资料的。一般说来,正史里这种记载比较少,而地方志里则相当多。学地理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搜集文献资料,通常都不习惯到正史中找材料,习惯于从方志中找材料,那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例如上海的地方志里说黄浦江是战国时楚国的春申君开凿的,春申君名叫黄歇,黄浦即因而得名,又给黄浦加上歇浦、春申江、申江几个别名。这完全是胡说,如何信得?现今上海市区是南北朝以后才成陆的,春申君时代这里还是一片海域,他怎么可能跑到海里来开河?方志里这一类荒唐的说法很多,千万不能上当。

第三点,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先秦古籍里有关古代地理的记载,原是很宝贵的文献资料。可是由于古人行文极为简练,后代的注疏家和研究者对这些文献所作的解释,难免没有误会、走样之处。所以我们处理这些文献资料,就该把古书原文和后人注释分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不应该盲从过去那些注疏家和研究者的解释,应该凭藉我们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运用科学方法去正确理解判断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古代地理情况。这样

^① 见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做才能不受前人束缚,解决前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作出超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举二个例:

第一个例:先秦有一个云梦泽,但古书里“云梦”二字不一定指云梦泽,多数场合都指的是楚王的一个以“云梦”都为名的游猎区。云梦泽是这个游猎区的一部分。云梦游猎区是跨大江南北的,而云梦泽则只存在于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汉之间。从西晋初年杜预注《左传》,错误地把《左传》中的“云梦”解释成云梦泽,从而产生了云梦泽跨大江南北的说法。这种误解自晋以后逐步发展,到了清初的经学家胡渭手里,竟然把整个江汉平原、洞庭湖区连同附近丘陵地带都包括在云梦泽范围之内。^①这种极端荒谬的说法直到建国以后还为一些地理学家所采用,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够察觉到杜预到胡渭的解释并不符合于先秦古籍中“云梦”的原意。我在前若干年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了一番研究,后来写成了一篇题为《云梦与云梦泽》的文章^②。我的方法是先直接从先秦记载去理解先秦云梦的真实情况,再一一破除杜预以来所有经学家和舆地学家的谬说,然后运用汉以后关于云梦泽的可靠记载,去理清楚云梦泽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这篇拙文主要取材于文献资料,也用了一些考古资料,但不多。总之,基本上全是用历史学方法对历史文献资料作了整理和分析,并没有采用野外考察和沉积物分析等地理学方法。可喜的是,地学工作者蔡述明同志利用钻孔资料,通过实地考察,也得出了不存在一个跨大江南北的云梦泽的结论,这就更证实杜预以来的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也说明了正确运用历史学的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个例:关于洞庭湖的演变。长期以来地理学界、水利学界根据近百数十年来的湖面日渐填淤,普遍认为整个历史时期湖面都是在不断地缩小,不同的只是有时快有时慢而已。那末,《禹贡》、《职方》、《尔雅》、《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这些古书讲到古代著名的泽藪,为什么都没有提到洞庭湖呢?《汉书·地理志》为什么非但不提到洞庭湖,在讲到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时,为什么又说成是湘水、沅水入江,资水、澧水入沅,都不提到入洞庭湖呢?过去人们都相信了前人洞庭湖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的说法,又相信了前人把《汉志》湘沅入江、资澧入沅勉强解作湘沅是由湖入江,资澧是在湖中会合沅水的说法,因此问题也就无从发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前身历史地理研究室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认真对待了有关洞庭湖的古代文献资料,才发现前人这种解释是相信不得的。若说洞庭湖是云梦泽的一部分,那末《楚辞》、《国策》为什么既有云梦,又有洞庭?随后我们搞清楚了云梦泽全在大江北岸,并不跨大江南北,更确信云梦并不包括洞庭。既然洞庭不是云梦泽的一部分,若说见于《楚辞》、《国策》的洞庭果然是一个大过于后代的,或和后代差不多大的大湖,那末《职方》、《尔雅》等古书里讲到九藪十藪时,为什么不提到洞庭,为什么不说不说楚有云梦、洞庭二藪?这么大的一个湖,《汉书·地理志》里怎么可以不称湘、资、沅、澧入湖,或入洞庭,而称入江入沅?不仅《汉志》如此,为什么在大约成书于东汉的《水经》里,也说是湘水、沅水入江,又说澧水也入江,而资水是“与沅水会于湖中,东北入于江”?这只能说明沅水、资水的下游有一个湖,这个湖既与湘水、澧水不相涉,显然不会很大。后来我们又发现在《庄子》里两次提到“洞庭之野”,竟然不把洞庭地区看作泽藪而目为平野;在《山海经·中山经》里提到湘水、沅水、澧水都是在“洞庭之山”附近与江水相会,却并没有提到洞庭山下有一个洞庭湖。经过这么一番认真考索,我们才确信前人对古书的解释绝对不可靠,先秦两汉的洞庭湖不可能象见于南北朝著作《荆州记》、《水经注》里所记载的那么大,更不可能有唐宋记载里所谓“八百里洞庭”那么大。否定了前人的误解,我们才得

① 《禹贡锥指》卷7。

② 载《复旦学报》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

出了一个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结论：原来洞庭湖在历史时期不是一直在由大变小，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我们根据这个结论先在我们所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按各个历史时期的记载作出了处理：春秋战国两汉只在今岳阳君山脚下画上一个小小的洞庭湖，把湘、资、沅、澧按照《汉书》、《水经》记载那样画作入江或入沅；从东晋以后才画上一个大洞庭湖，湘、资、沅、澧都注入湖中；南朝、唐、宋、元、明逐步扩大，到清图才缩小了一点。不过我们的清图是按 1820 年的情况画的，所以图中的洞庭湖还是比现在的大得多。

画图工作结束(指内部本)之后，我们又把这个课题交给张修桂同志请他作进一步的钻研。张修桂同志又根据湖区的地质、地貌、水文、考古和卫星照片等多方面的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写成了《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文。^①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是很出色的，由于采用了多种地理学方法研究下来的结果和我们原先用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正相符合，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我们在图上所作的处理是符合于历史真实情况的。张修桂同志的研究使这个问题解决得更细致、更圆满。由此可见，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工作要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必须同时采用地理学和历史学两种方法相互配合。而我们最初提出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基本看法却是从文献资料的钻研分析得来的，是从破除了前人的误解，建立自己的正确理解得来的，由此又可见正确对待文献资料的重要性。

三

上述三点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以下谈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文献资料中的沿革地理知识问题。

在我国有悠久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不等于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的研究范围没有历史地理那么大，沿革地理一般只要求讲清楚历代的沿革即变迁经过就行，不象历史地理那样还要求探索演变的原因和规律。所以侯仁之同志在他的《历史地理学刍议》里说：“掌握沿革地理的知识，只不过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要提醒大家的是：初步尽管只是初步，任何人做任何工作总得要健全地踏上这一初步，才有可能达到最终的目的。诚如仁之同志在同一篇文章里所说过那样，“沿革地理的知识，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可是现在有不少学历史地理的青年同志不愿意下工夫去掌握沿革地理的知识，有些学校里讲授历史地理课的教师也不够重视这方面的知识，往往略而不讲，我觉得这是关系到我们的队伍今后能否健全发展的重要问题，所以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这几年各地都在修地方志，不少省、区都办了地方史志通讯这一类刊物，我偶然翻阅，发现许多人讲到政区沿革时往往闹笑话。例如，《禹贡》不是大禹时代的作品，《禹贡》里的“九州”不是夏代的行政区划，而是战国时代学者对他们所知道的整个“天下”所作的地理区划，这是稍稍接受过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教育，破除了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人都能知道的常识。可是现在的地方史志工作者，竟然还有人在沿袭封建时代的老一套，讲到一地的沿革，还是从夏禹时属某州讲起。再如，唐宋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采用以州(包括府)辖县制，全国分成三百多州，隶属于十多个或二十多个道或路。在唐初至宋末六百六十年中，只有从唐天宝元年(742年)到乾元元年(758年)这十六年改州为郡，其余六百四十多年都只有州，没有郡。所以在简

^① 载《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述一地的沿革时,当然只能说唐属某州,宋属某州,但现在有的同志竟然在说什么某地唐属某郡,宋属某郡,好象唐宋时代都是在推行以郡辖县制似的。又如,历代正史地理志各府州下的户口数,指的是这个府州全境各县的,包括城市乡村都在内的户口总数,不是专指这个州的州治所在的城市户口,现在竟然有人在根据这些数字大讲起唐代扬州、宋代杭州的城市户口来了。又如,六朝时代的扬州和隋唐时代的扬州完全是两码事:前者在长江以南,后者在长江以北;前者以建康(今南京市)为治所,后者以江都(今扬州市)为治所;前者辖境兼及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各一部分和上海、浙江一直辖市一省,后者辖境仅相当今江苏扬州、南通两个地区;可是现在竟有人用六朝时扬州的资料来阐释唐代扬州的情况。这些岂不都是笑话?对沿革地理的知识这样懵然,那怎么能进一步做好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呢?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如何采取措施使搞历史地理教学、研究工作的人能够在短期内掌握一些基本的沿革地理知识,这是我们当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1982年8月27日

(上接第21页)

天条者男女皆斩”,甚至“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①……等等。但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象这样一个已经十分典型的新封建政权,却被美化成“农民阶级专政”的“农民政权”,尤其在十年浩劫期间,更被别有用心地无限拔高,把洪秀全和天京政权,进一步神化为可以与无产阶级领袖比美的“救世主”,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甚至稍加评论,就会遭到不堪设想的横祸。“四人帮”覆灭以后,这种极左谬论,虽已受到批判,但它的流毒,并未彻底肃清,至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比如,有些同志出于歌颂农民战争的良好愿望,继续在随意美化和拔高,说什么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太平天国的“乡官,由人民公举”的;甚至说太平天国的“议事制度既民主、又集中,是具有民主性质的”。另一些同志看到这些说法根本无法成立,又从另一方面为天京政权封建专制统治的性质开脱,说什么太平天国虽然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允许并支持地主收租,也“没有改变对农民经济上的保护和关心”,“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虽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但它仍然是‘维护农民阶级利益

的’”。甚至认为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也仍然是“农民政权”等等,就是明显的反映。尽管说这些同志都出于好心,但实际上却混淆了是非,错误地把农民阶级封建落后一面的糟粕,当成了进步革命一面的精华,加以宣扬,客观上起了“赞扬封建毒素”的作用。

总起来说,我们研究和讨论学术问题,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就是明辨是非,探求真理,揭示规律,为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根据和借鉴,而不是争个人论点得失。为此,就要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尊重史实,实事求是,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对则坚持,错则纠正。而那种明知不对,一味执拗,甚至不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史料,断章取义,任意解释,以及轻率下结论的做法,显然是极不妥当的。

最后,在结束这篇拙作时,我诚恳地表示,刘大年同志是一位老前辈的史学家,对我是由衷尊重的,而且完全相信,他既然如此断然否定“新封建政权说”,必定具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我殷切地企盼着拜读他的文章,尚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我将是乐于服从真理的。

^① 《太平天国》,第5册,第230-231页。